

秦

系文字研究

從漢字史的角度考察

陳昭容 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專刊之一〇三

秦

系文字研究

從漢字史的角度考察

陳昭容 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專刊之一〇三

秦系文字研究

從漢字史的角度考察

作者 陳昭容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
印刷者 長達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西園路二段50巷4弄21號
經銷商 樂學書局有限公司
臺北市金山南路二段138號10樓之一
電話：2321-9033
定價 精裝 新臺幣 650元
平裝 新臺幣 540元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七月出版

GPN：1009202035

ISBN：957-671-995-X（精裝）

ISBN：957-671-996-8（平裝）

序

從構思這個題目，寫出其中的第一個篇章，到最後一個步驟完成書衣上的簡介，交出完稿，前後竟花了十三個年頭。這其間，有自己慢郎中的個性、有凡事追到底的堅持、有時是為了等待重要資料公布。

八零年代初期，許多大陸出版的資料都還在「限閱圖書」的階段，借閱已經不易，更別提複印了，對於許多作古文字研究的學子而言，大概都有相同的經歷，需耗費很長的時間在圖書館手抄資料。傅斯年圖書館的收藏最為豐富，學界聞名，我在1983年底到史語所來，擔任李陸琦先生的助理，在那個複印昂貴、又沒有電腦、沒有掃描器的時代，我每天入坐寶山，歡欣喜悅，認真的在圖書館裡閱讀相關資料，以純手工的方式摘要整理，做成卡片。配合李先生「漢字起源與演變」的研究主題，我選擇了漢字發展史中，從西周到秦漢這段時間的文字演變，作為我的研究課題。這個領域，成了我的博士論文題目，在1989年入學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時提交的研究計畫中，全書的結構已經差不多完成了。

寫作及修改過程中的淹遲，時光有時是在等待中消逝。陝西鳳翔縣南指揮村秦公一號大墓的發掘，在1986年結束，其中出土的石磬文字資料，對於石鼓文年代的斷定非常重要，但是這批資料卻為了配合發掘報告而遲遲未公開發表。我撰寫〈秦公簋時代問題——兼論石鼓文相對年代〉（1993）時，雖然透過同行朋友的关系，看過少部分石磬文字的摹寫，卻需謹守同行慣例，完全不能引用。等待加上催促，珍貴的石磬文字資料終於在1996年6月出版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7本第2分發表，正好趕在我提交博士論文的前

夕，這時才能正式將這些資料採用進入文章中。對於論證石鼓的製作年代在春秋晚期，這是非常堅實而重要的支持。

幾年過去了，「限閱圖書」已成了歷史名詞，兩岸開放的脚步越來越快。遇到不解的問題，欲想實際赴出土或收藏處去一睹為快，已經不再是奢望。甘肅禮縣大堡子山墓地在1992-1993年被盜，文物迅速流散世界各地。最早被報導的是紐約古董市場上拍賣的一對秦公壺，有學者為文討論其年代，我也寫了一點不成熟的意見回應。其後禮縣出來的文物陸續被報導出來，1994年甘肅文物考古研究所緊急對該墓地作了盜掘後的清理工作，1998年西漢水南岸的趙坪村又有墓地被盜，其後進行搶救性發掘，確定是春秋秦墓。眾人引述資料不全，正式發掘報告也遲遲未刊布，出土材料越多，墓葬時代與器物關係卻更混沌。想要弄清楚情況，談何容易，國外的收藏不談，光是大陸的收藏單位，也分散在禮縣、蘭州、上海等不同的博物館。困坐研究室中，我為了〈論甘肅禮縣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出土文物〉這一章，因資料紛亂而一籌莫展，寫作工作停頓許久。

2000年十月中旬，我寫信給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的朋友，談到去禮縣及蘭州看出土實物的必要。很幸運的，陝西考古研究所正有去禮縣考察的計畫，我喜出望外，立刻向工作單位申請，得到研究院史語所的支持，十月下旬，隻身飛到西安，與陝西的學者們會合，乘坐一輛底盤特高、適於野行的車子，逆渭河向上。西行過寶雞，沿著秦嶺山腳下剛修好的310國道前行，過天水後轉向西南，進入嘉陵江的上游西漢水流域。崎嶇的山路旁麥苗初長，昨夜新雪細細薄薄的覆蓋在山間莊稼上，車行小路也因而泥濘不堪，前窗雨刷一路吃力的刷去泥巴，行行復行行，到達禮縣。這一路，行經之地，就是秦建國伊始及發展初期的主要地域，感受特別深刻，同時也瞭解秦沿著渭河向東擴展的地理條件及歷史必然。從禮縣出來，又去參觀當時收藏禮縣文物最多的蘭州甘肅省博物館、甘肅省考古研究所，回程再到上海博物館拜訪，初步把一些問題釐清。這一趟來回四千公里的旅行考察，已寫入本書當中，成為單獨的一章。

1996年春天，我以《秦系文字研究》為題，通過博士論文考試。取得學位並未帶來多大的歡欣，繳交的論文只是研究工作的一個段

落，當時還有一些章節沒有寫入提交的論文當中，也有許多新的資料要更新擴充，此外，還希望把文中提到的古文字字形，儘可能的以掃描方式貼入，呈現原形，這些都需耗費極大的功夫。現在這本小書雖以當初的博士論文為基礎，但是加入新的章節、擴充大量資料、更新許多細節、增補新的研究成果，與當年的論文相比，規模、內容已有相當大的差異。

這本小書出版，要特別感謝導師李陸琦先生指導，還有松丸道雄先生、裘錫圭先生、王輝先生、張天恩先生、李朝遠先生、王占奎先生，他們都花時間閱讀書稿或無私的與我分享珍貴資料。也要感謝陳美蘭小姐、陳炫偉先生、蘇彥榮先生、林宛蓉小姐以及編委會蔡淑貞、陳靜芬兩位小姐細心的處理圖版和排版校對。史語所提供良好的研究環境並支持所有的研究所需，也讓我感激。如果不是這麼多的良師益友和理想的工作環境，這本小書是無法完成的。

最後還要感謝小兒思翰、思穎，因著我常常遠行，他們從小就學習獨立生活，在我出遠門的日子裡，兄弟倆總是起居如常，以實際行動支持我追尋夢想。不論在多麼偏僻的地方，只要找得到越洋電話，我一定與台北家中聯絡。電話那一頭，他們的一句「媽媽只要照顧自己，不用擔心我們」，總使我寬心的勇敢前行。

這些年裡，最遺憾的是幾位影響我極深的師長親人離去，永遠循循善誘的忘年朋友高曉梅先生、嚴厲謹實的導師李陸琦先生，以及總是督促我努力的先夫吳劍雄先生。走過這不算短的歲月，花開花落，人聚人散，南港史語所成了我生命中最長駐的驛站，在這兒學習、成長，這本書，就是這段學習歷程的一個小小紀錄。

陳昭容 謹識

2003年初夏於南港史語所

目次

序	i
緒論.....	1
第一部份 總論篇.....	3
第一章 秦文字發展序列	5
第一節 前言	5
第二節 春秋秦文字——傳承與發展	6
第三節 戰國時期文字的多樣化——篆書、隸書與俗書	10
第四節 結語	12
第二章 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平議	15
第一節 前言	15
第二節 檢視王國維對〈史籀篇〉的重要觀點.....	16
第三節 秦系文字資料與《說文》籀文對勘比較.....	23
第四節 籀文與秦系文字對勘比較的量化分析.....	34
第五節 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平議	39
第三章 隸書起源問題重探	47
第一節 前言	47
第二節 秦隸資料及特色	47
第三節 秦隸淵源略說——兼談戰國秦篆秦隸的關係	53
第四節 六國率簡文字與隸書的關係.....	61
第五節 結語	66

第四章 秦「書同文字」新探	69
第一節 前言	69
第二節 「書同文字」相關文獻記載	70
第三節 近代「書同文字」研究的回顧及檢討	74
第四節 戰國文字異形的現象	80
第五節 秦「書同文字」的實質意義	86
第六節 結語	104

第五章 秦書八體原委——附論新莽「六書」	117
第一節 前言	117
第二節 大篆與小篆	119
第三節 蟲書與摹印	123
第四節 刻符與殳書	134
第五節 署書與隸書	140
第六節 結語	145

第二部份 分論篇

第一章 論甘肅禮縣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出土文物	149
第一節 前言	149
第二節 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出土文物	150
第三節 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出土文物的時代	154
第四節 從文字的結體風格推測大堡子山秦公諸器的器主	163
第五節 結語	167

第二章 論秦公簋的時代	171
第一節 前言	171
第二節 宋代到近代對盥和鐘、秦公簋年代的討論	173
第三節 從「受天命」的觀點看「十又二公」的問題	176
第四節 從文例與字體看秦公簋的年代	185
第五節 結語	191

第三章 論石鼓文的相對年代	193
第一節 前言	193
第二節 石鼓研究撮要	193
第三節 評唐蘭〈石鼓年代考〉——論石鼓文 不宜晚到戰國中葉	195
第四節 從秦系文字演變的觀點論石鼓文的相對年代	201
第五節 結語	209
第四章 論〈詛楚文〉的真偽及其相關問題	213
第一節 前言	213
第二節 〈詛楚文〉的出土情況及時代背景	215
第三節 〈詛楚文〉字體辨惑	223
第四節 從秦系文字的演變論〈詛楚文〉的真偽	234
第五節 討論幾個與〈詛楚文〉真偽有關的詞語	238
第六節 結語	245
第五章 秦兵甲之符	247
第一節 前言	247
第二節 列國虎形符節與秦虎符之區別	249
第三節 杜虎符	252
第四節 新鄭虎符	256
第五節 陽陵虎符	261
第六節 疑偽的東郡虎符	264
第七節 結語	267
結論	269
引用書目	273
圖版	301

緒論

近代文字學家常將古文字劃分為四大系，即殷商系、兩周系、六國系、秦系。其中兩周金文自宋以來，研究成果頗為豐碩；殷商文字自大批甲骨出土後，也蔚為顯學；六國文字因近數十年出土材料甚豐，字形變化大，也成為古文字學界重視的課題。秦系文字居於殷周古文與漢代近古文字之間，有其橋樑性的重要地位，秦的文字政策也關係著中國日後兩千年的文字統一。但秦文字過去由於材料缺乏，字形變化較少，其中部份重要材料，如宋代著錄的秦公鐘（以下據《歷代鐘鼎彝器款識》稱「盨和鐘」）、民國初年出土的秦公簋、宋代出土的詛楚文等，因年代、真偽尚有爭議；唐代出土的石鼓文論者雖眾，亦有諸多問題待考。每論及春秋、戰國、秦漢之交漢字發展歷史，往往以《說文·序》之論述為據。

近數十年來出土之秦系文字材料頗為豐富，重要者如甘肅禮縣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出土銅器、寶雞太公廟秦武公編鐘及鐃鐘、鳳翔秦景公石磬、大批銅器、兵器、陶器、璽印封泥以及戰國、秦、漢簡牘等。這些材料彌補了過去秦系文字材料不足的缺憾，為秦系文字研究提供具體而確實的基礎。學界對這些材料已有個別的討論，也有針對銅器銘文（王輝《秦銅器銘文編年集釋》）或陶文（袁仲一《秦代陶文》）分別作系統的研究；也有對各種質材的文字資料逐一討論（王輝《秦文字集證》）；也編有秦文字字表（袁仲一、劉鈺《秦文字類編》），還有文字學家對此一時期文字材料作綜合的論述（如裘錫圭《文字學概要》），都取得極好的成績。但利用這些傳世及豐富的新出材料，對春秋、戰國、秦漢之交漢字發展歷史作一全面性討論的專著，仍付闕如。就現有秦系文字材料來看，《說文·序》對這段時期文字發展歷史的敘述，實有補充及重新檢討的必要。秦系文字演變的研究，很值得我們站在前輩學者已有的基礎上，繼續努力。

本書以現有可見的傳世及新出秦文字資料為根本，站在材料信實的基礎上，對春秋、戰國、秦漢之交漢字的演變歷史，作縱向的論述。全文分〈總論篇〉與〈分論篇〉兩部份：〈分論篇〉是針對甘肅禮縣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出土文物、秦公簋、盥和鐘、石鼓文、詛楚文及戰國虎符等關鍵性而時代、真偽尚有爭議的秦文字材料，作梳理與論證。〈總論篇〉則是以確實可信的傳世及新出秦文字材料為基礎，以宏觀的角度縱向說明秦系文字發展序列，並討論春秋、戰國至秦漢之交五百餘年間漢字發展史上的幾個重要問題，包括：1、秦文字的發展序列。2、以《說文》籀文在秦文字中的使用情況，重新檢討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3、以戰國中期簡率刻劃書體與新出戰國及秦竹簡木牘對照，說明書寫質材與工具對隸書起源的影響。4、正視戰國文字異形現象，以戰國與秦漢文字資料為基礎，重新檢討秦「書同文字」的實質意義。5、以秦文字實際使用情況，說明「秦書八體」原委，並與漢代新莽「六書」作對照。

在漢字發展史上，秦系文字居於重要的橋樑地位。本文堅持以信實可靠的資料為基礎，以新材料、新方法重新檢討春秋、戰國、秦漢間漢字發展史上幾個重要的老問題，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統合諸多個別材料，對秦文字作全面的觀察與討論，期能呈現春秋、戰國、秦及漢初五百多年之間，漢字演變發展的真實面貌。

第一部份

總論篇

第一章 秦文字發展序列

一、前言

秦的先世居於西垂，至西周晚期而漸興，活躍於西北陝、甘一帶，歷經春秋、戰國，逐步拓展勢力，沿著渭河流域向東發展，戰國中期以後國勢更強，遠交近攻，東土各國一一不敵，終至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統一全中國。《史記·秦始皇本紀》太史公曰「至周之衰，秦興，呂於西垂。自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統一之後的秦，國祚雖短，但在歷史發展上卻有相當的建樹，秦所建立的各種制度，為漢及後代所仿，對於中國往後的發展，起了極大的作用。秦的文字政策「書同文字」「罷其不與秦文合者」就是其中之一。

秦自襄公送周平王東遷有功，獲賜岐以西之地，封為諸侯，於是始國，與列國通使聘享，到穆公時期，更是獨霸西戎。秦雖以宗周故地為立國根據，但長時間處於戎狄之間，與東方各國較為隔閡，中原各國對秦也充滿歧視，《史記·秦本紀》「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這種「諸侯卑秦」的情況，使秦在吸取周文化同時，也因與東方的隔離而在文化上趨向保守。

這種繼承周文化又保守秦文化的態度，反映在秦的物質文明與文化藝術中，¹ 文字現象也不例外。王國維曾指出「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猶有豐鎬之遺，故籀文與自籀文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較東方文字

¹ 參見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漢研究室編，《秦物質文化史》（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

爲近」。² 秦與東方各國文字皆出殷周古文，而秦的保守與東方各國的求新求變，同源而殊途，演變至戰國，遂有「文字異形」的現象產生。秦在兼併各國的同時，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政治勢力統一之後，秦文字理所當然成爲官方標準，並爲漢代所繼承。在漢字發展歷史中，秦文字位於宗周古文到漢代文字之間，實居於承先啓後的橋樑地位。

秦自立國始，經春秋戰國，到秦國滅亡，約五百多年，秦系文字從繼承西周風格，逐漸發展出自己的面貌，這個過程，從傳世及近年來出土的大量秦系文字資料中，已逐漸清晰的浮現。本文擬根據重要的秦系文字材料，縱向分析秦文字發展序列及其演變情況，討論秦文字在漢字發展史上的地位。

二、春秋秦文字——傳承與發展

秦之始國，於周平王時。由於西周晚期褒姒之亂，幽王被殺，秦襄公將兵救周有功，接著又以兵護送周平王東遷雒邑，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時爲公元前770年，這是秦正式爲諸侯國的開始。在此之前，秦人與周王室已多有往來，在西周晚期，陝西、甘肅地區的戎狄爲亂，周王室利用世居當地的秦人勢力制衡西戎，周宣王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又以秦仲之子莊公兄弟五人伐西戎，給予犬丘之地，封莊公爲「西垂大夫」。莊公就是秦襄公的父親。

在秦國歷史上，最早的文字資料是不其簋（圖版四）。³ 此器蓋爲傳世品，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1980年自山東滕縣後荆溝一號墓另出土一簋，⁴ 銘文與傳世簋蓋相同。⁵ 這兩件器物銘文相同，所記爲周宣王

² 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觀堂集林》（台北：商務印書館，1979台二版），卷七，頁293。

³ 李學勤，〈秦國文物的新認識〉，《文物》1980.9：25-31，又收入《新出青銅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頁272-284。根據李學勤的研究，不其簋器主名「其」，正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記載秦莊公名「其」，「不」爲先秦時常用的無義助詞。

⁴ 萬樹瀛，〈滕縣後荆溝出土不其簋等青銅器群〉，《文物》1981.9：25-29。

時秦莊公破西戎有功受賜，作此器以記功頌德，作器年代約在820 B.C.左右。⁶ 從秦文字發展的角度來看，不其簋的銘文風格與西周晚期文字風格無別，實處於繼承時期。

春秋早期的秦文字資料約可分為三部份：（一）甘肅禮縣出土秦公器群，包括「森公乍寶用鼎」兩件（圖版五）、「森公乍寶簋」兩件（圖版六），以及「森公乍鑄用鼎」九件（圖版七、八）、「森公乍鑄用簋」四件（圖版九）及「森公乍鑄尊壺」一對（圖版一〇）。⁷ 此二器群皆出於甘肅禮縣大堡子山秦公墓地，⁸ 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載秦早期有襄公、文公葬於西垂，⁹ 森公器群與森公器群的主人可能為襄公（777-766 B.C.）與文公（765-716 B.C.）二人。¹⁰ （二）陝西寶雞太公

⁵ 傳世不其簋蓋與後荊溝出土不其簋器為同一件器物，只是器蓋分置兩地。見萬樹瀛，〈滕縣後荊溝出土不其簋等青銅器群〉，頁25-29；李學勤，〈不其簋的佳話〉，《新出青銅器研究》，頁285-286。

⁶ 李學勤，〈秦國文物的新認識〉，頁25-31。又李學勤〈試說宣王早年曆日〉指出，宣王四年（820 B.C.），依建子，九月庚子朔，戊申初九日，正合不其簋銘文「惟九月初吉戊申」是庄公伐戎當以古本《竹書紀年》所說「宣王四年」為正。見《夏商周年代學札記》（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頁220-223。

⁷ 李朝遠，〈上海博物館新獲秦公器研究〉，《上海博物館集刊》7（1996）：23-33；James Lally & Co.圖錄（1994年6月）；王輝，〈秦文字集證〉（台北：藝文印書館，1999），頁10-11；戴春陽，〈禮縣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關問題〉，《文物》2000.5：74-80。

⁸ 禮縣出土有銘銅器皆為盜掘品，或流落海外、或為上海博物館所收購、或為公安繳獲。禮縣位於天水西南，即秦時稱「西犬丘」地區。

⁹ 《史記·秦始皇本紀》（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頁285。莊公葬地不詳，以其西垂大夫的身份，也有可能葬於西垂，但史籍未載。

¹⁰ 白光琦，〈秦公壺應為東周初期器〉，《考古與文物》1995.4；陳昭容，〈談新出秦公壺的時代〉，《考古與文物》1995.4；李朝遠，〈上海博物館新獲秦公器研究〉；陳昭容，〈談禮縣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文物〉，《大陸雜誌》95.5（1997）；王輝，〈也談禮縣大堡子山秦墓地及其銅器〉，《考古與文物》1998.5。詳見本書〈分論篇〉第一章〈論甘肅禮縣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出土文物〉。

廟出土秦公及王姬編鐘、鎛鐘（圖版一四、一五），¹¹ 作器者為秦武公（697-678 B.C.）。（三）卜淦□高戈、¹² 傳世秦子戈（圖版一二）、秦子矛、¹³ 故宮藏秦子戈（圖版一三）、¹⁴ 西安市公安繳獲「秦子元用」戈、¹⁵ 及「元用戈」兩件。¹⁶

以上春秋早期的秦文字資料以太公廟秦公及王姬編鐘、鎛鐘銘文較長，編鐘銘一百三十五字（其中重文四，合文一），鎛鐘同銘唯行款不同。鐘鎛文飾與西周晚期類似，但「字體已有一定的秦篆意味」，¹⁷ 這一點是有目共睹的。早於太公廟器的 森公器群銘文字體尚未出現明顯的秦篆意味，而森公器群雖然銘文字數不多，但其字體風格與秦公及王姬鐘、鎛趨近，而與不其簋遠，則相當明顯。¹⁸ 太公廟出土的青銅器與禮縣出土的森公器群文字具有某種程度的篆意，可以做為春秋早期秦正式書體的代表。秦子戈、矛等兵器文字與禮縣出土銅器群和秦公及王姬鐘、鎛比較，顯見其鑄銘粗糙，宜視作當時比較隨意的書體。

春秋中期的秦文字資料闕如。春秋晚期的秦文字資料則相當豐富，包括（一）鳳翔南指揮秦公一號大墓出土石磬銘文（圖版一六、一

¹¹ 盧連成、楊滿倉，〈陝西寶雞縣太公廟村發現秦公鐘、秦公鎛〉，《文物》1978.11：1-5。

¹² 王輝，《秦銅器銘文編年集釋》（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以下簡稱《集釋》），頁156-157，圖版188。銘文「卜淦□高乍鑄永寶用逸宜」，鑄款淺，字體細小不清。

¹³ 《三代》19.53.2；《三代》20.40.3。二器同銘，殘銘互補「秦子作造公族元用左右弔鉉用逸宜」。王輝《集釋》頁7-12訂為秦出子（703-698 B.C.）器。

¹⁴ 《殷周金文集成》17.11352，銘文「秦子乍造中辟元用左右弔鉉用逸宜」。

¹⁵ 吳鎮烽，〈秦兵新發現〉，《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頁563-572。

¹⁶ 劉得楨、朱建唐，〈甘肅靈台景家莊春秋墓〉，《考古》1981.4：298-301，銘文「□元用戈」。王光永，〈寶雞市渭濱區姜城堡東周墓〉，《考古》1979.6：564，銘文「元用」二字，據王輝《集釋》頁155考證，皆為春秋早期器。

¹⁷ 李學勤，〈秦國文物的新認識〉，頁15。

¹⁸ 李學勤、艾蘭，〈最新出現的秦公壺〉，《中國文物報》1994.10.30；陳昭容，〈談新出秦公壺的時代〉。